

6. 舍勒:《价值的颠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7. 王一川:《意义的瞬间生成》[M]. 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8.
8. 布尔特曼:《生存神学与末世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5.
9. 许纪霖:《寻求意义》[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7.

10.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1. 李焯昌:《亚洲处境与圣经诠释》[M].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6.
12. 郭吉军:《自然的信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3.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责任编辑:汉河; 校对:丁言

非圣贤、反英雄的商业才子

——近代(1897~ 1949)报刊文人的世俗性格与游戏心态

● 赵孝萱

(台湾佛光大学 文学所副教授兼所长)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专事写作,以办报编杂志为业的文人群体,他们既不以科考出任为目的,也不求撰写藏之名山之巨著,而是为大众世俗而编而写,世俗性商业性很强。上海、香港、台北、台南都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文人,其价值取向并无大异,世俗性格与游戏心总极为相似,并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新文化界、文学界虽对此多所挞伐,但这是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精神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关键词〕 近代;文人群体;世俗性格;游戏心态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4)01-0019-06

一、绪论

近代中国因报刊事业之蓬勃,出现了一大批以专事写作,以办报编杂志为业的文人群体。这类文人多执掌大报副刊或小报,既不以科考出任为目的,或根本未能登科;也不求撰写藏之名山之巨著。他们是为大众世俗而编而写,世俗性与商业性很强。其笔下的“小报”,所谓“小”者,稍有“不登大雅之堂”之意。这类报刊不太登载政治时事与历史兴亡,却有浓厚的文艺气氛与消闲娱乐气味。其中或有丛谈文汇、或有典故杂感、或有小说连载、或有诗词骈赋以及戏词、游戏文、笑林、剧评、谜语、打油诗、北里消息、青楼动态、娱乐活动讯息等。或也刊载街谈巷语、隐私秘闻,而以揭露为快。是一种兼具市民趣味与文人雅兴的报纸。这类报纸并不仅限于上海,同时期的台北、台南、香港、甚至新加坡,都出现这类风格极为近似的“小报”。而不同地区文人的价值倾向,也并无大异之处。

若以当时报刊的整体数量来看,其编者作者与读者人口应颇为庞大。这群文人精于文字功夫,文章与文字能力是他们赖以依存的的本领。举凡小说、笔记、古文、辞章、吟诗作对、酒令射谜等多所精通,甚至戏词、剧评、影评、广告词也多为此类文人操笔。他们不属学者大儒之类的读书人,而属专擅文墨的文学人。他们上报馆戏园混迹青楼,行止之风流

才调,颇似传统“才子”形象。他们也确实以才子名士自诩。颇类似自宋代以来书会才人、小说家剧曲家,如冯梦龙、金圣叹之类闲笔文士的传统。

沈从文描述海派文人所提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之两重特质,可谓一语中的。蔑视责任礼法、追求古雅情调之名士倾向与商业竞争之世俗姿态本质上是矛盾的。但此一矛盾却和谐地在这些商业才子身上呈现。他们甚至以文化明星之姿引领风尚,又能对商业机制、娱乐体系产生主导性之影响。文人能如此影响传媒娱乐业,应属空前绝后。此一文化现象,更是不容忽视。但这类特殊行径,少不了引发“堕落”之批评。诸如:追逐社会流风习气、欠缺社会责任等。这群文人与当时以编报纸来“宣传”的另一种知识阶层,在价值与目的之追求上是对立的。此乃近代知识阶层分化后之结果。新文化界、文学界看不惯如此不担负社会责任,却对社会产生如此重大影响之文人群体,多所挞伐,如何看待这类批判观点,也是待解决的课题。

二、文人事业才人笔,名士何妨作废人

上海竹枝词言:“锦绣文章才子笔,新闻主稿拜先生”。又言:“时事都登报馆来,蝇头小字费编排,文人事业才人笔,书面争夸点石斋。”好弄词章本为才子之重要特质,这群报人是近代能成功经营文字、驾驭文字之才子群体。他们不都是

作品卓然成章的作家,却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凡成名的报刊作家,几乎都能写能译能编能演,无论文言、语体文字的驾驭能力,都在水准以上。他们多是古文辞章的能手,但也能写道地的白话小说,情节生动、对话鲜活,对人情世故的体会,也多有可观之处。但是除了才调,既风流又有玩赏意识,才是才子本色。才子佳人总以词章相较,相互悦慕。人人尽说风流好之余,才子当然就多了点粉黛之色。或进行礼法道德之否定,或认为狎妓是风雅流韵之举。传统世俗社会对“写闲书”“能吟诗”的才子总带着莫名的崇拜。晚清以后,报刊发达,小说地位提高,又给许多作者提供了作才子的机会。“才子”一流人物成为近代小说最常见的题材。《花月痕》、《金陵秋》(林琴南)、《玉梨魂》(徐枕亚)、《春明外史》(张恨水)、《人间地狱》(毕倚虹)等莫不如是。不论是言情小说、哀情小说、侠邪小说绝不会缺少才子的词章之才、冶游之举。毕倚虹作小说《人间地狱》,看重“文人名士+恬静派信人”的“清游风味”^①。又如写《海上花列传》的韩邦庆早年的《太仙漫稿》虽被称之为奇才,但乡试揭榜依然名落孙山,从此绝意仕进,开始了编辑与小说创作的生涯。他为《申报》写些论说文章,与《申报》编辑钱锺伯、何桂笙等一群上海名流诗人相酬唱。但他常将“笔墨所得之资,悉挥霍于花丛”。他们办报纸宣扬浪游花丛的生命态度,例如:1905年7月创办的《闲娱日报》,就是娱闲于美人颜色,名士文章。

这群才子除了会写小说、笔记、古文、词章外,也多擅长传统文人之才艺,举凡书画、篆刻、戏曲、工艺等,也多所精通。“以民初作家为代表的旧派小说家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才子型的,其表现形式是偏擅玩赏。……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富有审美意味。他们在群居、独处生活中的情趣,艺术化人生的修养,事业中的游戏趣味都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化的表现”^②。他们的聚会与游玩,多带有点旧才子的放浪气息,却又不失高雅。例如1922年成立的“星社”,是一群报刊文人诗酒风流的雅集。他们定期举行各种茶话、酒集、联吟、作对等文字游戏^③。十五年的活动中,有春禊游赏、重阳酒叙、持螯会挥毫作画、新年射虎、展览各自搜集的工艺品。在雅集时,他们常出现如醉酒、狂饮、恣谈、酩酊等等放浪的狂态。如一次持螯会上文人范烟桥的行止:“烟桥不顾,狂饮恣谈,日与直山半狂辈辩蹦蹦戏之来历……酒后烟桥题诗,自称醉笔,及执笔而大呕。于是始信烟桥果酩酊也。一夕欢饮,印象深刻。”

如此这群才子多少带点放诞的名士气质,他们喜撰文引介历朝名士风流轶事,以效仿之,如新加坡《南熏三日刊》第二期《唐寅漫笔》:“唐寅伯虎,有妒花歌一首,描写美人状态娇憨之象,如活现纸上,歌云:……名士风流,于此可见。”不但对所谓的“名士风流”心向往之,也颇喜欢强调自己玩世猖狂、颓废荒唐、乖张顽劣、玩世不恭,偶而也发点笑傲王侯的名士脾气。如台湾《三六九小报》所言:

同人中,除刀水荆如二君,老成持重,颇有长者风以外,莫不玩世猖狂,豪迈不羁;就中犹以绿珊盒主与柳轩为最。而绿珊盒主,更擅口技,其翻莲妙舌,能令忧者为喜,哭者破颜。日前偶相携到天国茶店小饮,见面红耳热时,君遂再开

其悬河之口,使一辈女招待,尽为抱腹绝倒。中一号政江者,犹觉笑不可仰,欢极不觉颠声俏骂曰:“废人!”举坐又为哗然。同人中有口占一绝,代为解嘲曰:“应是东方滴降身,偶从游戏悟前因。美人倘解相怜意,名士何妨作废人。”读是诗,则君之风流放诞处,自可想见。杏庵(静室小言)收入台湾《三六九小报》第456号,1935年6月19日)

从上文可以想见这群文人之“玩世猖狂”、“豪迈不羁”、“风流放诞”。几天后,又有人针对“废人”二字响应:

废人,是身有残疾者,或不务正业,或毫无树立,或身有毛病、近于颓废者之称谓也。绿珊盒主平素号东方曼倩,乃某女给以废人称之,味其辞,似奚落中带些惺惺意。绿珊盒则一笑受之,宜乎震谷之谓“美人倘解相怜意,名士何妨作废人。”(榕庵<荒唐斋小话>收入《三六九小报》第457号,1935年6月23日)

榕庵,赵剑泉之号,台湾《三六九小报》主编与创办人。其父为南社第二任社长赵云石。此一“废人”之讥,颇示其任诞不羁,傲世轻俗。“无用”与“不才”为这群文人常用之笔名,如王韬即号“天南遁叟”、孙家振号“退醒庐主人”。这种不求有用、不求世用之弃才观念,与《红楼梦》宝玉之人生价值颇为近似。

如此行径,或有人目之为六朝名士或江南才子:“这种萧闲如六朝人的生活,无论哪一个团体都望尘莫及。”^④他们像传说中明末的江南才子那样过得优雅平和^⑤但这群人似乎并不特别强调魏晋风度中姿态的洒脱飘逸与风度的优雅从容,却颇耽溺于排除道德常规、逸出格套的放纵美感^⑥。

三、拥抱商业世俗,引领风潮话题

早年办报文人社会地位不高,社会甚至视之为“不名誉”^⑦。如左宗棠的印象,“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⑧但是随着报刊事业之发达与影响,这些报人小说家后来俨然成为文化名人,当时广告也以这些文化名人为招揽社会,利用知名文人的知名度进行商业宣传。例如当时上海中法药房的老板黄楚九,研制出一种叫“爱罗补脑汁”的药品。黄楚九特别请当时知名文人、官吏在广告中现身说法。1910年6月29日《申报》刊出了标题为《吴趸人为黄楚九推广<爱罗补脑汁>》的药品广告,占了当天之大半版面:

黄楚九兄大阁下,承赐<爱罗补脑汁>六瓶,仅尽其五,而精神已复归。弟犹不自觉也,家人自旁观察得之,深以为庆幸!……弟吴沃尧顿首

在一般公众心目中这些文人似乎有明星风采。上海《礼拜六》杂志后一百期甚至有冠以各种雅题的作者小影^⑨。新加坡《南熏三日刊》头版有一大幅<本刊同人摄影>之照片。照片为男子四人,或斜站或侧坐,或西服或长衫,各具姿态。在头版置放编辑“沙龙照”,俨然以文化明星自居。这些小影似乎也有点吊影自怜的才子情调。

这些报人大都是杂学家,从文化层次言,是属于沉浸于旧文人情调文化,又深得俗文化精髓的人。他们紧贴市场,与小市民习气相通,衔追小市民的庸俗兴趣。近代不论是新闻、传媒、商业机制、娱乐体系与广告,都与这群文人有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除报纸杂志外,这群小报作家编辑们几乎

专题研究

执掌了当时所有的文化传媒(如杂志、戏剧、电影、广播、广告、插画等),满足了大众各面向的文化娱乐需求,也道出了读者们普遍关心的政治与社会议题。孙家振,可为代表人物。孙家振,字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退醒庐主人。幼娴诗书但淡泊科举,长期在《申报》《舆论时事报》《新闻报》任主笔或编辑,也主编《梨园报》《笑林报》等报刊。他还曾为地产商所创办上海最早的游乐场“楼外楼”做过设计与筹划。他也以写《海上繁华梦》小说(连载于李伯元的《繁华报》上)闻名于时,叙述旧上海的种种事物。此外孙玉声还著有《上海沿革考》、《沪墟话旧录等》(在《金刚钻报》上连载两年)等,对上海各式掌故,了若指掌。他也是上海第一个灯谜团体萍社的领袖人物。经常在九江路文明雅集茶楼、青莲阁主持谜会,而且有意地累积各种类型的谜语,之后由进步书局汇刊成《春谜大观》一书。风气影响,后来在新世界、大世界等游乐场都有射文虎之娱乐活动,许多娱乐小报也喜欢刊登谜语使射虎猜谜一度成为海上时尚。

这群人对社会风向之嗅觉颇为敏锐,这些报人如何引领着时代风潮?什么是他们认定与带领的时髦与前卫?他们许多创意影响了报刊发展的趋势,的确颇具引领时尚与风骚之姿。例如,1897年《游戏报》首办妓女选美票选活动,所有读者可以票选中意的妓女。当年夏季推选花榜,经文人墨客推荐为第一甲状元、探花、榜眼,同年秋,接着又有春江武榜、淞滨叶榜。同时称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为花界四大金刚。此一小报掀起的花界旋风,惊动沪上,家喻户晓,蔚为风潮。从此登录花界新闻成为小报惯例,二十年而不衰,直至《晶报》出现此一风气才渐消弭。如时人评论:“昔南亭亭长李伯元征君创《游戏报》,一时靡然成风,笑颦者踵相接也。”^④《游戏报》1898年1月28日开辟用“白话写新闻演义”,也是开风气之先。又如《礼拜六》杂志的周刊形式也是创举。周瘦鹃编《半月》首先开始使用三色铜版,编《紫罗兰》时把美女画作为次页,封面镂空,女子倩影则从空隙间隐约透出,也是当时的特例。《晶报》三日一出,创上海报史三日刊之先河,叶劲风编《小说世界》,首先在卷头专刊电影照片,并首先开始使用“银幕”两字;另外经常附赠童话或民众文学的小册子,也是当时独创。

这群作家与他们的作品与中国二三十年代电影、新旧戏剧都极有关系。通常是小说被改编为如文明戏、京戏、粤剧、越剧或电影之剧本,或是自己写剧本。如包天笑在《小说时报》创刊号发表的《一缕麻》,在10年代被改编成时装京戏由梅兰芳主演,20年代改编由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挂名夫妻》,40年代又改编为越剧由袁雪芬主演。又如周瘦鹃改编自法国小说的《爱之恋》,被春柳社等文明戏团多次搬上舞台,他自己也客串过《血手印》等文明戏,也写1924年大陆影片公司发行的《水火鸳鸯》剧本。除此之外,王钝根、程小青、郑逸梅、徐碧波、陆澹盦、严独鹤、张秋虫、江红蕉、朱瘦菊等也都为电影公司写过剧本。张恨水早年不但自己演文明戏,他的各种小说,也不断被改编,其中《啼笑姻缘》被改编成话剧、电影、舞台剧、京剧、沪剧、河北梆子、粤剧、评剧、越剧、曲剧、评弹、大鼓、黄梅戏等等,而且是不断地翻新演出。写《江湖奇

侠传》的向恺然(1890—1957),也排演京戏和拍摄影片,其中《火烧红莲寺》改成一本接着的一本连续演出的京戏以及电影(胡蝶扮演女侠红姑)。向恺然后来还到北京改行任京剧团的编剧。另外,李寿民(1902—1961)的《蜀山剑侠传》,神怪色彩很浓,便于海派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大翻花样,因此上海大舞台在40年代也连续排演了数十本之多。作家们除了编剧外,还有开戏剧学校以及电影公司者,如滑稽大师徐卓呆。他也亦编亦演,早年参与文明戏的编演,他曾和欧阳予倩一起组团。1917年张季直在南通办伶工学校,约徐卓呆去教课,又委他与欧阳予倩一起去日本考察戏剧学校。他也开过两家小规模的电影公司。

小报文人与当时娱乐活动及娱乐场域之关系特别密切。因此从小报中探究近代文人与娱乐文化之关系:其中包括与戏园、剧场、书场、茶楼、咖啡馆、妓院、电影、话剧、游乐场等,就特别有意义。这些报刊作家也正确掌握当时的商业消费机制与广告市场。当时上海四大百货公司楼上的屋顶花园,百戏杂陈,游戏场竞争激烈。之前提过,上海最早的游乐场楼外楼,为地产商所创办,就是延请孙玉声(海上漱石生,《游戏报》主编)设计策划。为了公布游艺节目,上海各大游艺场都办了小型报,除节目与戏单外,也刊载一些文艺小品。从孙玉声、天台山农帮“大世界”游戏场办《大世界报》;周瘦鹃曾帮“先施百货”出版宣传小报《乐园日报》;包天笑帮“永安公司”出版游戏场报《天韵报》等事,可看出这些文人当时应颇能掌握消费脉动,嗅出时代风向,所以大企业才有意委托其长期制作文案。广告商看中杂志的销量而争取合作,报人需要广告商的奥援。这些报刊与广告并非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互利行为。若以21世纪的眼光来看,办刊物、搞媒体者要争取读者,要争取广告,要嗅知社会风向,要掌握商业脉动与文化市场机制,不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善于利用有趣之文案,进行多角化经营。这些文人当时之社会地位以及对社会之影响,恐怕有重新估量之必要。

近代广告业之发展也与文人之介入有关。商业竞争下,广告文案之大量需求,造就了文人与商业广告的密切关系。当时报业多为文人所掌控,广告公司也多为知识阶层所创办。广告公司1934年多达30家。许多学术渊博的知识分子任职广告部,甚至可说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造就了近代广告业之兴盛。

当时出现许多空前绝后的文人广告叙述文案,文笔极富巧思且颇引人发笑。如新加坡《南熏三日刊》“皮鞋店”广告,就是明显的文人广告创作。文字极多,引经据典,又兼具故事性、叙述性、灵异性。其中又是慷慨赴义,又是投笔从戎,又是抗日情操,时代性与时事性极强。

1928年8月8日广告标题为:“征尘万里归何日,试占鬼卦问鞋儿”。其下标注:星洲牛车水庙仔街十号“小新橡胶皮鞋店”。其旁以蝇头小字进行陈述:

何秀卿梁肖我之未婚妻也。梁生自二十条密约缔结之后悲愤欲绝。深痛结此亡国之恶果者,官僚军阀造其因。辗转沈思,毅然投笔从戎。欲以个人之热血,洗此奇辱。临别时,谓其未婚妻曰革命不成功,勿望我还也。由是一去十年,

杳无音信。不期五卅之山东惨案发生,济南死伤华人不下五千。秀卿闻之,痛哭无已。疑其葬身于枪林弹雨,忧虑杂感,乃执其珠履,试占鬼卦。双履皆俯,卦凶,秀卿惊恸,谓其夫之死耗也。适有术士,过而问之,得其详。乃就其占卦之俯履观之。底有小新店号可保至好四字之钤记。遂慰之曰,卿误矣。曾不见可保至好之佳兆乎。汝婿不久将归而且荣也。未几,党军已入北京之电报传来,从兹军事动作,暂告结束。梁生因战有功德,擢升师长,于是告假六个月,来叻与秀卿共道契阔。闻他俩不日将结婚于某礼拜堂云。

此一广告,又像小说,又像笔记,宣传重点在于“小新店号可保至好”之意。另一广告标题在1928年8月15日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种标题绝对出自文人之手,不过“小新橡胶皮鞋店”为何会出现这种广告标题?

黄罢之子耐生,现肄业于中华学校。目下秋季上课之日期已近,耐生双履,乃上学期在“小新橡胶皮鞋店”所购者,经已穿着一载。自觉陈旧不甚趁时,乃请于父,易其旧观。父曰,鞋旧耳,若非破绽者,仍可穿也。耐生闻言,心殊耿耿。一日穿鞋上课,睹物生仇,恍然叹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谓此鞋何时而烂也。然耐生之父,乃热心之爱国者,方隐几读济案惨史,愤激愿弃其生。陡闻子言,以为表同情于抗日也。乃跃然起,执其父之手,一同往市。曰:我爱尔,世界上应有之鞋履,咨尔所欲予必为尔致之。

另有新加坡《南熏三日刊》1929年元月9日笔名综者撰写之“张永福平民树胶鞋厂”广告,标题为“吊破鞋”。是以新文学新诗腔调为之,不同于其它多为文言之叙述形式。上述广告忧国忧民,下述广告则带有浓重的社会关怀意识:

鞋啊!你破了?鞋啊!你破了?你为何不穿在富人脚上?你为何不登上豪华的庭堂?你为何跟着这穷?这穷得要命的人儿到处流浪?……

这群文人的雅士生活既富雅趣逸兴,但如何能不受到滑稽的世俗趣味的干扰?逸兴与俗趣如何能在同一群人身上兼容?的确费人思量。牟宗三说名士具有不浊不俗的清逸之气:

名士者,清逸之气也。清则不浊,逸则不俗。……精神落于通套,顺成规而处事,则为俗。精神溢出通套,使人忘其在通套中,则为逸。逸者,离也。离成规通套而不为其所淹没则逸。逸则特显“风神”,故俊。逸则特显神韵,故清。故曰清逸,亦曰俊逸。逸则不固结于成规成矩,故有风。逸则洒脱活泼,故曰流。故总曰风流。风流者,……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适性为主。^①

因此名士既然要“清逸”,就要离成规通套,不主故常,不浊不俗。但如此之性格姿态,又似乎与切近俗世的价值观毫不冲突,实在难以理解。或许是个人拒绝市民的趣味主义,维持古雅的生活格调;但是却可投身世俗,纵浪商业竞争之中。这种雅俗气质集于一身的文人,价值追求既分裂又和谐,不过却颇一致地以“玩”与“游戏”作为人生的重心。

四、玩世不恭,游戏人生

近代报刊文人以游戏的眼光看待一切,发展出近于游乐、闲、娱、戏的人生哲学,总以嘻笑戏嘲之方式看待一切。

如上海之《游戏杂志》(1913)序:

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霸称王,一游戏之局也。楚汉相争,三分割据,及今思之,如同游戏。……考韩柳奇文,喻马说龙,游戏之笔也。良平妙策,鬼神傀儡,游戏之戏也。……祖德宗功,上下五千年,其肇始之初,不过游戏之偶也。由是言之,游戏岂细微事哉。顾游戏不独其理极玄,而其工亦伟。……其余如捕蛇者说,卖柑者言;莫不藉游戏之词,滑稽之说,以针贬乎世俗,规箴乎奸邪也。……而知今日之供话柄趋睡魔之《游戏杂志》,安知他日不进而益上,等诸诗书易礼春秋宏文之列也哉。

或是如台湾《三六九小报》(第459号,1935年6月29日)烟虎之(吃烟室):

编辑余暇,搁笔吹烟,氤氲之气,暖透一室。正吞云吐雾,大举气焰之时,适某先生在止。语次,偶及近来汉学之衰,相与咨嗟不止。倩影曰:“汉学之不振,汉学家当负其责之半。盖今之汉学家,多以韬光养晦为能事,既不能振作精神,以诱掖后进,又不能作组织的研究,有所发明。间有一二有心者,出为论难,冀有所得,则立趋感情,变为漫骂,如是欲冀汉学之振兴,不犹缘木求鱼者乎?”绿珊盒主,口衔纸烟,以手摩挲其圆光头颅曰:“当此花花世界,弱肉强食,贤愚一辙,以我眼光视之,大之不过一戏台,小之仅一赌局耳。盛衰消长转瞬皆幻,得个中三昧者,自能悟领人生哲学。彼辈汉学家,既不知义雀之为何物,又何怪其终年吃吃,只为油米盐柴之苦役也耶?”

如此视一切大事要务为“游戏”、视世界为“游戏之场”、视历史为“一场游戏一场梦”,以所谓“游戏人生”的态度否定蔑视一切,以致发展出一套“万事不关心”的哲学,颇近似“轻人”之生存观;与魏晋名士如王衍、王澄、谢鲲、桓彝“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晋书》卷四三,王衍传)之价值思维颇为类似。

当时因此出现大批追求“快活”、“轻松”、“游戏”、“愉悦”之媒体;大批报刊抱持着游戏的文学观,以娱乐为目的,也不足为奇。例如《消闲钟》“丈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趣报》发刊词说:

天不趣,则失其为清;地不趣,则失其为灵;人不趣,则失其为雅……善饮者得酒之趣,善游者得游之趣,善赏者得莺花风月之趣,善食者得蔬果鱼肉之趣,即今之善嫖者,亦各得书寓、长三、幺二、野鸡之趣。……以趣之所在,天地不可夺,鬼神不能移,文兄师保不能挽回而化导。

这些报刊对时事也常采取戏谑、嘲弄、讥讽、游戏之态度,其中之文人价值与游戏之人生心态颇堪玩味。这种嬉笑怒骂、非正经的游戏态度,背后可能是更严肃沉痛之书写姿态。面对国事、战争、政治、社会议题时,这种嘲讽戏谑之态度,其实传达了对时局另种深层之愤懑与不满。若究其原因:可能包括政治高压,不敢直抒;或者对政治失望;或者放弃追逐高远之可能性,而类似自我放逐。这类以貌似轻松实则迂回之态度,或是以令人较为接受之轻松态度表达,是一种修辞技巧与姿态之选择。这种蔑视人生之严肃意义、且嬉游人生之态度,过去总受到许多非议与指责。这其中不但关

涉到工作与游戏孰重之理解,更涉及如何看待人生之问题。工作通常被认为是“道德”的,而游戏被认为是使人愉悦的。但“愉悦”若不被贬为不道德的行为,至少认为不是“道德”的。寻常认为只有工作才是正事的想法,贬低了“游戏”的价值与意义,人们总是在使自己的时间与空暇“有用”起来。所以抱以“感时忧国”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学者,多蔑视非严肃之“游戏”态度。

当时也的确流行及时行乐、重消遣享乐的风气。王韬日记曾记载晚清社会重嬉游的盛况:“仕女如云,肩摩踵接,斗鸡走狗为戏。集茶寮中,几无隙地。”^⑩例如《申报》有两篇劝人行乐的文章,十分典型:

人生斯世,忽忽如过隙之驹,茫茫如丧家之狗……何须劳碌以终身?万事难成,岂可妄求而快意?与其终年辛苦,费尽机械而空忙,何如一日消闲,略任心身而好逸。所以一心安泰,方能行乐以及时,百体畅舒,何必自苦而乃尔也乎^⑪。

况此三万六千日内,人生有无数忧愁困苦,疾病颠连以及利锁名缰,衣食奔走,以阻人行乐之地,使徒有百岁之虚名,并无数岁享生人之乐者焉。又况乎生斯世者,未必皆耄耋期颐也乎。此浮生若梦,为欢几何。^⑫

上述观念与列子《杨朱篇》主张肆意享乐之思想颇为近似:“人之生也,奚为哉。唯美厚尔,为声色尔。……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生命的价值被定位在感官当下的享受与满足。但如此,是否会带来玩世不恭的价值毁灭?

这种“无处不可玩”“无事不有趣”的游戏心态,也让这类文人一起“玩”文字,包括点将小说、集锦小说、别裁小小说、悬赏小说、开放结尾由读者续写的小说。如此增加公众参与意识,由编者与读者一同进行文字游戏,让大家玩得“万虑皆忘”(《礼拜六》发刊词“一篇在手,万虑皆忘”)。

农业社会本视逸乐为罪恶,但因近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出现许多店铺林立、商业化繁荣的近代化都市。除了生活品质提高,各种外国文化也带来极多趣味,经济生活发生改变以致有余闲从事娱乐活动。但这是西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影响之直接结果吗?^⑬商品经济社会不一定就会形成消闲享乐之风,也不一定引发及时行乐之感。但社会整体好逸乐的风气到底从何而来?玩乐如何会成为文人生命的重心?国运颓败,世事江河日下,文人被抛进世事的深重苦难中,越是对生存焦虑痛苦,就越是热切地追随艳姬的身影。个人身体的快乐需要,既然已经成为文人追求自我的主要目的,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走向世俗享乐的温柔之乡。教坊青楼于是成为领受快乐的天堂。因为,若不走上感官享乐一途,何以遣有涯之苦难之生?

五、无聊文人游戏之笔,舞文之场?

这种价值态度引发当时知识分子之强烈批判。如罗家伦说:

社会不愿意有世界眼光,新闻记者就不谈国外的事;社

会不好学,记者就闭口不谈学问;社会喜欢欺诈作恶,新闻记者去搜辑许多小新闻来作他们的参考;社会好淫乐,新闻记者就去征访无数花界伶界的消息来备他们的遗忘。上海北京有些“正经一点”大报,也受风气影响,增设评花评戏的附张,设消闲登载满纸的花讯,报导花园花总统的消息,以及人家太太小姐轶事;甚至印出种种照片,替一般娼妓分“访单”。(志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页121)

或如蔡元培说:

我国新闻,于主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海淫的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且广收妓寮的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贻害社会之罪,尤不可恕。(蔡子民《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蔡元培选集》页241)

或如沈雁冰(茅盾)说:

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简直中了拜金主义的毒,是真艺术的仇敌,对于艺术不忠诚的态度,再没有比这更厉害了(《自然主义与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7号。1922年7月)

或如沈从文说:

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终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的教育机关中。这些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北平《大公报》)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如邀请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沈从文,1934年1月10日北平《大公报》。)

小报文人是否是风格庸俗、行为媚俗?到底是不是“是无聊文人游戏三昧之笔,舞文弄墨之场?”面对社会负面评价,这两种不同之道德判准,以及价值意义之差异问题,牵涉到不同文人阶层差异的对立与冲突。知识分子以严格的道德主义,视此为不正经与玩物丧志之举,认为不但影响青年进德修业,也是社会堕落的动力,更与新文化运动之宗旨相违。两者对传播媒体应肩负社会责任与社会教育之功能定义实不相同。但也有例子证明当时某些文人看花侑酒与启蒙救国之姿态并不冲突,如王韬就兼具了西化启蒙与才子风流两种对立的特质。他虽曾任格致书院院长、以西学为核心,也任《循环日报》《万国公报》主笔,臧否国政时事;但他终身爱好看花曲院、载酒旗亭之事。他佯狂海上,出入花丛,交际间、总要飞笺召妓陪酒:“弟看花之兴,老尚未衰,绮席所呼侑觞者蓉初、月舫而外,另有张素云词史,即所称中西合璧者也”^⑭他还常为妓女赋诗题联,屡次参加评选海上名花活动,被推为风雅宗主。

其实,中国小说自古就是拿来消遣的,所谓“消遣”的文

学观,应该是太理解当然不需辩解的写作态度。就像朱自清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朱自清《论严肃》一文。载《中国作家》创刊号)。倘若为金钱而写,是艺术的仇敌;那么视文学为工具价值的新文学史观,将文学功利化、实用化、工具化,则是对艺术的另类不忠诚。

此一二分现象或可视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象征性权力斗争”(symbolic power struggle),就是占据发声地位者如何取得文化定义权的过程。此乃关涉到文化正当性(legitimacy)的问题,后来的评论者选择与学院知识分子对立的阵营“划清界限”,既可较易获得论述的正当性,也可避免受到主流意见的攻击。其中过程可清晰瞧见社群区隔以及权力运作的影响。

注 释:

①范伯群:《秋波之恋·编者按》《中国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之四),南京出版社,1994。

②参考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97页,2000年。

③民初诗酒流连之文社很多,并不限于报刊文人,为当时文坛学界流行风气。以上海“淞社”规模最大。民国二年成立,由刘翰怡、周庆云主持社事。此外,上海还有“希社”,参加的有周庆云、姚文栋、潘飞声、邹强等,以豫园寿晖堂为社集,月凡一举,为文酒之

会。沈曾植也发起“超社”与“逸社”,郑孝胥则有“一元会”。

④郑逸梅:《星社文献》,收入《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⑤李嶠明:《浮世代代传:海派文人说略》,华文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

⑥美总是要透过非常规、非格套的方式,才能呈现。为了单显出生命之美的瑰丽风姿,有时确实需要排除道德的常规矩。然而这仅是道德之行的一时例外,而非不道德。因为美与道德的本质原非矛盾,所以单显美才会给人无压力的愉悦而让生命得到解放。……自由的人生,就是审美的人生。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由无碍的生命,就是美的生命。”引自李清筠《魏晋名士人格研究》台北:文津,2000,第40、41页。

⑦⑧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131页等处。

⑨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史话》,见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⑩周桂笙:《新庵笔记》卷上。

11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68页。

12《王韬日记》页三。

13 14《申报》1872年6月13日、12月7日(劝人行乐说)。

15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283页。

16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编《史料丛刊》,1987。

责任编辑:汉河;校对:丁言

转型期现象与无家可归的文人

关于《废都》的文化分析

● 邵宁宁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 尽管《废都》在文化趣味和艺术性上都存在着某种与现代生活不和谐因素,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本,它仍然为解读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内容。本文通过对《废都》的文化分析,描述了社会转型期文人价值的失衡,“传统之城”的解体,及无家可归的精神境遇。

【关键词】 《废都》;社会转型;价值失衡;解体;无家可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4)01-0024-04

《废都》是发表于十年前的一部畅销小说,在出版当年引起的轰动,大约只有80年代张贤亮发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的盛况可以相比,两者同样因直接描写了性而引起了大众读者的关注,所不同的是前一次还借有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的余绪,而后者已挟裹入90年代市场化的狂欢仪式。《废都》的发表,给作家贾平凹带来了又一度的社会注意,同时也招致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非议。事隔十年,尘埃落定,所有的花絮也都飘散零落,但对它的评价仍然人言言殊。在我看来,尽管《废都》在文化趣味和艺术性上都存在着某种

与现代生活不和谐的因素,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本,它仍然为解读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经历了十年的沉淀,现在再看《废都》,也许既可以保留一点现场亲历的直观,又不至于做出过分情绪化的评判。

一、社会转型与价值失衡

《废都》一开头,主人公庄之蝶就陷进一桩官司里了。这场有关“名誉权”的诉讼,把我们迅速带入一种转型期社会的当下语境。“名誉权”这个概念尽管早已被写入了法律,但在中国社会里,一个人用付诸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名誉,